

# 牟宗三的谦恭与傲慢

刘火

自传《五十自述》中，牟宗三臧否了一批同辈、师辈学人，除了对恩师熊十力大加赞扬，他还肯定了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因为在他看来，可观担当起复兴华族的重大历史责任，非自己、唐、徐三人而已。而对于其他一些学者，牟宗三并没有那么客气，因为自恃手持“中国文化生命”的尚方宝剑，牟宗三在自传中对同辈或前辈学人瞧不起的、痛骂的不在少数，甚至对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也是褒贬兼有。

1958 年，50 岁的牟宗三（1909—1995）在台湾出版了他的自传《五十自述》。在这册自述里，有很重要一部分内容，点评相交、相识、相恶的同辈与师辈名人。

先说臧的。牟宗三崇敬的首推熊十力（1885—1968）。关于熊十力，牟宗三只怕中文里没有誉词来表达他对自己恩师的崇拜。“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一生之中，在个人对牟之影响如地球于宇宙之中，如人子于父母之前。牟是这样叙述他与熊十力会面的。在北大三年级（1932）时，因牟之老师邓高镜引荐，在中央公园处，熊先生头戴瓜皮帽、面带病容但胡须飘飘而至。刚到，熊

先生即说：“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对于一个正值心高气昂的北大青年才俊来说，牟非但没有表现出不快，而是直觉告诉他“这先生不凡，直凭他不客气，凶猛得很”。从此，牟便终身将其视为良师和恩师。在《五十自述》里，有许多赞美熊十力的词汇，现抄录部分，可窥牟之太阳与月亮。

自以为是自性情和真生命的牟宗三，在遇熊师之时，“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一个当头棒喝”。接着牟说，清三百年以来，“人们的心思不复知的向上一机”，因熊先生所著的《新唯识论》和《新理学》，“由熊先生的霹雳一声，直复活了中国的学脉”。因熊先生不“趋

势”、不“随风气”、不“笑脸相应”，而是高标学人品格矣！牟宗三对熊十力先生的赞美之辞接着说，“熊师那原始生命之光辉与风姿，家国天下族类之感之强烈，实开吾生命之源而永有所向往而不至退堕之重大缘由”；“吾于此实体会了慧命之相续”，“熊师之生命即一有光辉之慧命”；“当今之世，唯彼一人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此大生命是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之合一。他是直顶着华族文化生命之观念方向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而抒发其义理与情感。他的学问直下是人生的，同时也是宇宙的”。牟宗三进一步说道，“惟大开大合者，能通华族慧命而不隔。在以

往孔孟能之，王船山能之，在今日，则熊师能之”。后来在重庆，熊十力向人推荐牟宗三：“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不论熊十力与牟宗三两先生当时的学问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仅师徒二人的关系，师传如父，投桃报李，可谓空前绝后。

“知我者君毅”之君毅又是何种姿态呢？首先，牟宗三认为，除熊十力先生外，对牟一生中另一个“最大的缘会”便是“遇见了唐君毅先生”。在牟看来，君毅“是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君毅“是一个哲学家的气质，有玄思的心力”，“这是我从来所未遇到的”。这主要是唐君毅对牟宗三的德国哲学思想



和精神的真正开启（其实在此之前，牟已经很深地接触过了康德的哲学）。牟说，“吾对于精神哲学的契入，君毅兄启我最多”，“因这他自始

（下转 15 版）➡

➡（上接 13 版）

方特性。世界各地现代化颇多相似，世界各地现代性则少有相同，理一而事殊，此之谓也。因此，讨论现代性，总离不开地方性。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丽敏在其新作《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中，通过西书翻译、古籍整理、文学期刊、小学国文教科书等四个方面，探讨商务印书馆所生产的近代知识，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影响。

这四个方面，是商务印书馆业绩的主要板块，也是以往研究者重点论述的对象，该书的敏锐和独特之处，在于将这些方面置于近代中国所处国际大环境下讨论，置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定语境中分析。这样，就将商务诸方面贡献，从事的陈述，上升到理的剖析，将企业的事功，放大为民族的应对。作者指出，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经历了从器物、政制再到文化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其

蓝本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进程，在欧美发达国家，通常表现为一对矛盾运动，即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现代性与以公平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现代性的相摩相荡；而在中国，这种现代性追求，除了表现为西方那样惯常的矛盾运动，还包孕了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有反抗，这样，既学习西方，又企图反抗甚至消解西方的两面性，注定了近代中国文化现代性在价值指向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因为有此

丰富性与复杂性，所以商务在展开翻译、古籍、杂志、教科书诸项事功过程中，以一种高远的眼光，既注意古今、中西、新旧之别，又努力打通古今、中西、新旧之间藩篱，纵览古今，涵摄中西，融通新旧，为当下与日后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分析，涵泳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征之以翔实的史料，很有解释力。为了避免自己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特质的解释，与学术界已有的约定俗成的“现代化”、“现代性”概念混为一谈，董丽敏别出心裁，单用“现代”一词，而不用“现代化”、“现代性”来指称，并对此专加论述，由此可见她对自己创见的珍视。这一审慎思索后的洞见，我们不妨简称为“董见”。

在我看来，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其实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对天下大势、时代变迁与中国传统有敏锐的觉解有关。追根溯源，他们坚

持的那条路径，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重视当下、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有些事，远看了似乎轮廓清晰，身在其中反而界限模糊，有如韩愈所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所谓中西、新旧、古今，在近代许多人那里，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混沌一团。王国维有云：“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 卷，第 365 页）

在今人看来，这很有些后现代味道，但在秉持实践理性者那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也是我在上面特别申述张、王等人转型意识的用意所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商务印书馆京华印书局的排字车间（摄于 1905 年）  
资料图片